

从“知青一代”的职业流动看社会变迁

彭希哲 任 远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回顾性调查资料分析了知青一代人的职业流动特征, 以及与其前后两代人的差别, 论证了宏观社会经济背景对个人职业流动的决定性影响, 和个人文化程度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提出应对知青一代这个特殊的人口群体作深入的研究。

一、作为生活事件一代人的“知青一代”

社会变迁给经历这种变迁的每一个人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但这种影响对不同的出生队列人群又由于其在彼时彼地的地位、经历、角色、生命周期的特殊阶段等的差异而折现出显著的代际特征。在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着的社会, 每一代人在其生命周期的同一阶段所经历的生存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 造就了每一代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思维定势和生活方式。研究这种代际特征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有助于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理解社会变迁和流动, 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发展。

本文尝试从职业流动的角度探讨知青一代的生活经历。我们所研究的“知青一代”, 是从生活事件一代人上加以定义的。他们出生于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 基本同新中国一起成长, 青年时期经历“文化大革命”, 或深或浅地介入到上山下乡的历史过程中; 青壮年时期, 亲身参加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现在是各行各业的接班者和栋梁骨干, 同时又正经受着经济结构调整的严峻挑战。这一代人的主体是 50 年代的少先队员, 60 年代的红卫兵, 70 年代的知识青年, 80 年代改革开放的建设主力军, 90 年代的思想家、企业家、政治家和各行各业的技术骨干。他们的生活经历充满了波折起伏, 从中可以映证出我国自 60 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变迁, 也可以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知青一代的生活处境的变化状况。

为了更好地揭示知青一代的特征, 本文将其分别与前一代人口群体和后一代人口群体做代际比较。根据研究目的和所用数据资料的状况, 本文以 1927~1937 年出生人口作为“革命一代”, 1947~1957 年出生人口作为“知青一代”, 1967~1977 年出生人口作为“改革一代”。“革命一代”人年轻时经历过战争年代, 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他们发挥才干的舞台, 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他们正当壮年时的工作和发展机会, 现在普遍到了退休离休的年龄; 知青一代后的一代人, 可以将他们称为“改革一代”, 他们基本没有受到十年动乱的影响, 接受了正规的中小学教育, 有条件获得大学教育, 他们生活和工作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这种分类虽不是非常严密, 但是能基本反映这三代人口的不同特点。

本文使用的是回顾性调查的数据。^① 调查对象是1994年生活工作在城市中的人口。通过对调查对象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和子女就业生活变迁的回顾获得每个年度该个人的有关资料,特别是职业流动的资料。通过对年龄别的控制得到各队列(Cohort)的资料,并可以重现革命一代、知青一代和改革一代这三个队列的人生发展过程。该调查数据集共记录了501户居民,2005份个人职业变动资料,其中,知青一代人口有244人,革命一代人口有561人,改革一代人口有23人。由于改革一代样本偏小,在解释时应谨慎从事。从整体上讲,由于回顾性调查资料的完整性和队列分析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的有效性,用以研究知青一代的职业流动是有说服力的。

二、职业流动的代际年龄别的比较

我们将发生职业流动者占总劳动者的比重作为分析职业流动范围的指标,平均流动频率和流动者中平均流动次数作为反映职业流动强度的指标。由表1可以看出,知青一代较之革命一代,流动范围更广,但平均每人流动频率并无明显增加。改革一代在流动频率和流动强度上都比知青一代有显著增强。简言之,革命一代的职业流动特征是“小范围,低强度”,知青一代的职业流动是“大范围,低强度”,改革一代的职业流动特征是“大范围,高强度”。

同一年龄组的代际间职业流动表现出不同特征。如以20~30岁青年的职业流动为例,革命一代主要是向工人流动,其中很大部分人口是由服务性行业、军人、中小学教师和其他个体职业转来的;知青一代的青年时期也是向工人流动的,但流动前的职业以农民为主(考虑到研究对象是城市人口的职业流动,这部分当年的农业活动人口绝大多数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其向工业活动人口的流动现象,表明了在这代人青年时代后期的“回城”经历,回城初期,主要从事工业生产活动);改革一代青年的职业流动就不是以工人为流动的主要方向,而是以智力型职业流动为主,在商业、服务业、技术人员等职业间流动,流动强度和流动范围都明显扩大了。

同一时期不同代际人口队列的职业流动特点也不相同,如改革开放以来,知青一代和改革一代的职业流动的共性是向商业、服务业转移显著,但知青一代的特点是从工人这一职业流出的增加,而改革一代基本没有经历过当工人的阶段;知青一代在改革开放时期职业流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在由工人流向商业服务业人员大量增加的同时,有一部分人上升为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企事业和政府部门的干部,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知青一代的分化有强化的现象。

三、职业流动发生事件的波动特征

职业流动的发生不是均匀分布的,其事件发生的年份呈波动性。从图1可以看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构成职业流动波峰变动的宏观背景。1965年以来的知青一代和革命一代的职业流动呈现共同的波动特征,1970~1974年是第一波的高峰,1978年前后是第二波的高峰,1984年是另一次比较大的高峰。这种峰谷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实施、知青回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城市经济结构调整的进展等历史事件

^① 本文资料来源于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和美国杜克大学合作进行的“中国城市居民就业生活调查”(1994)中上海市的有关数据。

对职业流动产生的影响。职业流动的相应增加(波峰)就成为这些历史时期社会变迁的一个表征。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以来,知青一代职业流动有进一步上升的倾向,但因为职业流动对历史事件的滞后效应和所获取资料的局限性,这一进程未能在本研究中更充分地表现出来。

表1 职业流动的代际年龄别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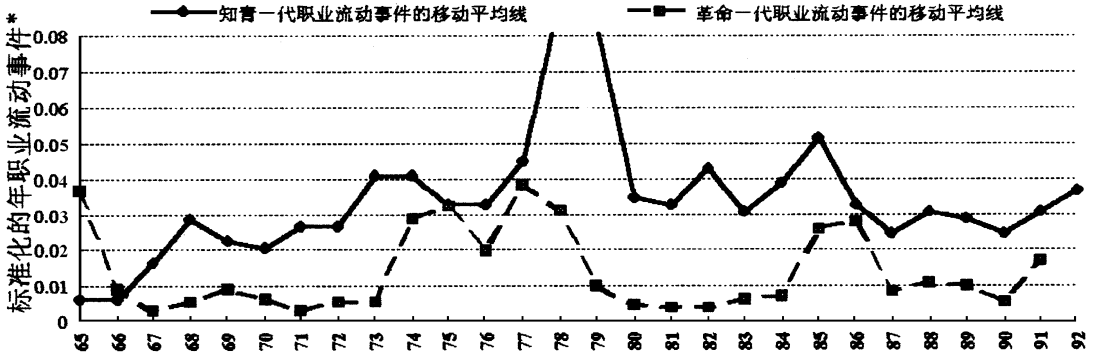
革命一代	20~30岁	30~40岁	40~50岁	50~60岁
平均职业流动频率	0.40	0.10	0.17	0.12
流动者占总人口比重	32%	9%	15%	11%
流动者中平均流动次数	1.56	1.12	1.3	1.05
流动方向特征	流动者原职业主要是工人、解放前参加工作、军人,以工人居多,占总流动事件数的26.1%,流入职业主要是工人,占51.3%,其他则为一般管理干部、办事人员。	工人(21.8%)、专业技术人员(12.7%)和农民的流出较多。流动方向以工人和各级管理干部为主,分别占36.4%和23.6%。	工人(39.0%)、技术人员和各级干部的流出较多,主要流动方向是各级管理干部和工人,分别占35.4%和14.6%。	干部和工人是主要流出的职业,分别占15.3%和42.3%,流入职业较为分散。
知青一代	20~30岁	30~40岁	40~50岁*	
平均职业流动频率	0.68	0.28	0.06	
流动者占总人口比重	49%	25%	3%	
流动者中平均流动次数	1.38	1.11	1.79	
流动方向特征	主要从工人和农民流出,分别占总流动事件数的27.6%和45.5%。主要流入职业是工人(30.9%)、售货员(10.6%)和一般管理干部(10.6%)。	职业流动的主要原职业是工人(41.2%)、办事员和服务业人员,流动方向是较高级别的管理干部和负责人、工人、服务业人员。	从干部和办事人员的流出和商业活动人员的流动是突出的现象。	
改革一代	20~30岁*			
平均职业流动频率	0.74			
流动者占总人口比重	39.1%			
流动者中平均流动次数	1.9			
流动方向特征	主要从服务业、商业和专业技术人员流出,流动方向为商业活动人员(25%)、工作人员(25%),和服务业人员。			

*由于调查年份的限制,所获取的职业流动资料只截取到1993年。知青一代40~50岁组和改革一代20~30岁组的平均职业流动频率和流动者中平均流动次数数值是根据这两代中40~47岁和20~27岁人口的资料外推而得。考虑到改革一代中本科毕业生在22岁左右,研究生毕业在25和28岁左右才开始参加工作,改革一代的平均职业流动频率和流动者中平均流动次数是最低程度的估计值。

知青一代和革命一代职业流动波动的时间特征是非常一致的,反映出历史事件对居民生

活的普遍影响。但是,革命一代的职业流动曲线基本上一直低于知青一代。知青一代的标准化的年职业流动事件数为每百人 3.39 次,革命一代的标准化的年职业流动事件数为每百人 1.48 次,反映出知青一代的职业流动强度高于革命一代的现实情况,也说明知青一代更深刻地受到 1965 年以来各政治经济事件的影响。

图 1. 两代人分年代别的职业流动事件数



* 标准化的职业流动事件数是年职业流动事件数和该队列人口数的比值。

四、职业流动事件时间间隔

知青一代的职业流动的平均发生间隔为 6.86 年,革命一代为 13.8 年,改革一代为 2.66 年。从分职业序次别的平均职业流动间隔中可以看出,各人口年龄组的职业流动间隔都呈现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而逐步缩短的趋势。而职业序次别的职业流动间隔也依从革命一代到知青一代到改革一代的顺序逐步缩短(参见表 2)。

	分职业序次别的职业流动平均时间间隔		
	第一次职业流动	第二次职业流动	第三次职业流动
革命一代	15.59	10.35	13.61
知青一代	7.31	6.36	4.71
改革一代	3.14	2.38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从 60 年代到 90 年代,同一出生队列人口的职业流动时间间隔呈逐步减少的规律。知青一代 70 年代之前的平均职业流动间隔为 10.6 年,1970~1979 年的平均职业流动间隔为 6.7 年,1980~1989 年的平均职业流动间隔为 5.0 年;革命一代 70 年代之前的平均职业流动间隔为 14.8 年,1970~1979 年的平均职业流动间隔为 8.46 年,1980~1989 年的平均职业流动间隔为 4.6 年;改革一代 90 年代之前的平均职业流动间隔为 3.68 年。而在每个时期知青一代较革命一代职业流动间隔为短,较改革一代职业流动间隔为长,从革命一代到知青一代到改革一代,职业流动的时间间隔在不同年代中也基本呈现逐步减少的趋势。反映出不同年龄队列在社会变迁中有不同的适应方式和发展道路。

从职业流动时间间隔的分析可以看出 60 年代以来,社会变迁的节奏不断加快,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者的需求也不断变化,导致职业流动的频率在时期上、代际间都逐渐加快了。

五、知青一代职业流动的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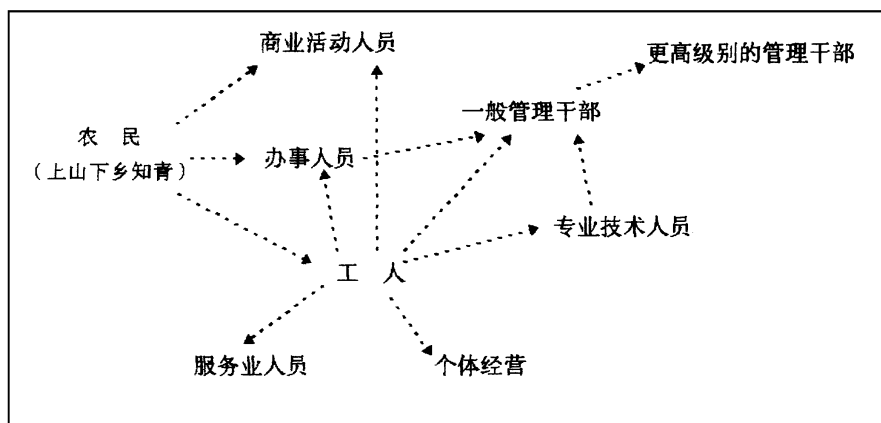
从知青一代的首次职业来看,农民占 22%(绝大部分是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工人占 15.4%,这两类群体构成了职业流动起点的主体。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职业群体,如军人等。分析表明,初始职业的不同对日后的职业流动等生活经历有重大的影响。

1978 年前后返城的原农业活动人口主要从事务工、经商和成为一般办事人员。其后在 1984~1987 年间,有较大一部分工人发生职业流动,成为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和办事人员。

就初始职业是工人的劳动者而言,其流动在 1977 年和 1984 年形成两个小高潮,主要的流动发生在 80 年代之后。工人流动的差异性非常强,几乎所有职业地位的上升下降的起点都发生在工人,尤其在 80 年代后半期以后,引起了很强的社会分化。

知青一代已有不少人现在成为社会各单位各部门的各级领导干部和负责人。一般管理干部的主要来源是工人、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各级领导则普遍都经历了一般管理干部阶段后才走上更高的管理岗位,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 90 年代的初期。(以上的职业流动结构参见图 2)

图 2 知青一代的职业流动结构



六、教育程度对知青一代职业地位上升或下降的作用

职业不仅是经济变量,受产业结构影响,同时也是社会变量,是决定社会地位、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尺度。社会地位主要包括权力、声望和财富三个层面,“但在实证研究中,权力、财富和声望是很难操作化的,实际上在现代社会里,职业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权力、财富和声望”(李若建, 1995)。社会地位和社会分层的测量划分有主观法、客观法和综合法,在各种划分标准中,表层的有利益、教育程度、生活方式、收入和政治组织等,深层的是财富的占有和社会分工,职业的分层是“联系社会阶级、阶层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中介,它既可以和深层结构中的社会分工、财富分配和占有、权力相联系,又和表层结构的各种因素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换句话说,它同时可以转换为财富分层、权力分层等”(张琢, 1992, 第 141 页)。所以,用职业来研究社会地位和社会分层,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经典的方法,即“一个人的职业是决定其社会

地位的最基本因素”(David Popence, 1977)。正如索维指出:“社会地位并不是容易确定的,从前,这更多是一个身份和条件问题,而不是职业问题。……如今,人们的职业以及在职业中的地位则起着重要的作用……”(索维,1992,第331页)。职业流动是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表现形式,就宏观而言,反映了阶层结构、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和不断整合。

为了研究职业流动带来的地位上升或下降,采用一个有效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量表是必要的。这样,职业从定类变量转为定量变量,职业量表中数值可以代表对职业地位高低的估计,职业地位高低不等的特性也就可以表现出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曾在1990年通过对北京和广州两个大城市的调查进行了“职业分层研究”。本文参考北京大学研究中使用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量表来分析上海知青一代的职业流动。

按照职业社会经济地位量表的分类,知青一代职业流动呈现出较为明显和较为普遍的上升性,有49.0%的人口发生了上向流动,12.2%的人口发生了下向流动。在所有流动者中,上向流动比重约为80%,下向流动比重约为20%。知青一代在其生活历程中,基本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奋斗获得比初次工作更好的社会地位。职业流动的总体上升性,说明这一代人生活的社会背景存在着人们向上流动的社会空间,而上升流动的普遍性也说明这种社会空间是对社会大多数人开放的。

知青一代初始职业的平均地位级分是62.44,目前平均地位级分为67.18;革命一代初始职业地位级分为64.37,他们离退休前的平均地位级分为64.52。知青一代较之革命一代,生活的起点更低,而社会经济的历史性发展,给他们创造了更为广阔的机会空间,知青一代比上一代人有更多的机遇去追求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知青一代职业地位的上升性也说明了个人社会经济地位提高和整个社会进步的一致性。

在影响个人职业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各种微观因素中,教育发挥了突出重要的作用(见表3)。其重要性首先表现在教育和目前职业地位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不管其初始职业状况如何。

表3 教育和职业地位的变迁

	教育和初始职业地位的相关系数	教育和目前职业地位的相关系数	教育和职业地位上升下降程度的相关系数	模型方程: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变迁 X:受教育年数 Y:职业地位上升或下降的程度
革命一代	0.4472 (P=0.000)	0.5117 (P=0.000)	0.0584 (P=0.178)	$Y=0.04X+0.02$ (t=0.924 sig t=0.3563)
知青一代	0.186 (P=0.009)	0.4578 (P=0.000)	0.3121 (P=0.000)	$Y=0.87X-4.7$ (t=3.956 sig t=0.0001)

一般来说,教育程度高的人口总是可以最终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

知青一代和革命一代的比较中,教育对职业地位变迁的作用又有两个特点:第一,对初始职业而言,知青一代初始职业和教育的相关系数远较革命一代为低,说明了知青一代在刚刚进入社会时,由于遇到上山下乡的历史事件,其职业地位同受教育程度是不相称的,甚至是教育水平越高,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可能越大,职业地位越低的情况,反映出当时社会对知识对人才极度不重视的情况;第二,从教育对职业地位上升或下降影响的程度而言,知青一代明显超过革命一代。知青一代通过不懈努力,勤奋学习,获得更高的文化程度,从而取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例子屡见不鲜。从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的方程模型中也可以看出,知青一代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年,职业地位级分增加0.87,而革命一代只有0.04。知青一代较之革命一代,作为后致因素的主要内容的教育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表现得更为突出。与之相应,家庭

背景等先赋因素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则不断减弱,反映出中国社会从先赋社会向后致社会的逐步转变过程。90年代以来,知青一代职业流动中,一方面向上流动至各级管理负责人和技术干部,同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由工人向下流动从事餐、饮、服等类工作(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下岗待业和职业转变中)。影响这种职业分化的主要原因正在于个体教育水平的差异,这也说明,尽管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个人发展具有决定性、根本性的作用,个人在同样的发展环境中也有不同的发展际遇和生活经历,而这种不同很大程度是由于教育水平的高低造成的。

七、讨论:代际特征与职业流动

由于比较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发达国家的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流动模式也比较稳定,表现为职业流动以微观因素的作用为主,即主要受到个人的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初始职业等影响。过去的50年间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这种社会转型期的职业流动,受到宏观的社会、经济、历史等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政治事件对职业流动也有明显强大的作用。但在另一方面,职业流动又不完全是由宏观社会变迁决定的,个人的因素一直对职业流动发生重要的影响。其中教育程度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它不仅影响流动倾向,而且决定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和流动程度。

知青一代、革命一代和改革一代,三代人口的不同生活历程,都可以从各自的职业流动中表现出来。三代人职业流动特征的明显不同,和同一代人在不同时期职业流动状况的不同,可以反映出60年代以来我国剧烈的社会经济变迁。革命一代职业流动的“小范围、低强度”,知青一代职业流动的“大范围、低强度”,和改革一代职业流动的“大范围、高强度”,是这三代人口职业流动的基本区别。

对知青一代而言,其流动的起点是农民和工人,作为农民,绝大多数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1978年和1984年前后是知青一代职业流动的两个高峰,前者主要是知青的返城,后者主要是由工人作为起点的多向化的职业流动。90年代初期,向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和管理领导干部这两大职业的群体的分化已经初露端倪,并将继续下去。可以明显感到的是,到90年代上半期为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和1984年的城市企业改革,是影响知青一代职业流动的主要历史事件,由农村返回城市务工和1984年以后从工业活动人口的流出及流向的多向化,构成知青一代职业流动的基本概貌。

遗憾的是,由于调查的时点和样本量的限制,1993年之后知青一代的职业流动趋势在本文中虽有所表现,但未能细致地加以描述。可以说,90年代是知青一代分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具体表现为知青一代部分成员的“下岗”和再就业(从工人流入商业服务业很大程度与此进程一致)和另一部分成员对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接班(流入各单位管理负责人员与此进程一致)上。对此需要更多的资料以便作更深入的探讨。

与我们知青一代在时间上相仿的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Baby Boomer即“婴儿出生高峰人群”。顾名思义,这是指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由于这一人群在数量上和社会经历上的诸多变迁,在各国都成为较为特殊的一个人群。比如在美国,对Baby Boomer一代人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这代人的经历、特点、分化,以及他们对当前和未来社会经济的影响等都成为研究和传媒追踪的对象。近年来这一代人对美国未来社会保险制度特别是养老金体系的压力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重要话题之一。

而我国,除了文艺界有较多的作品直接以这一代人为原型外,学术界对此的研究相对很薄弱。

本文是以上海为研究地域的。知青一代是对上海未来人口和就业问题影响最大的出生队列。首先是这一代人的绝对数量大,成为人口年龄金字塔中凸出的一段。其次是这一代人较为特殊的人生经历。由于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教育事业的破坏,虽然其中许多人在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完成了高等教育或参加了各种职业教育培训,这一代人相比其他年龄组来说整体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偏低。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推算,1990年时35—44岁年龄组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只有9.4年,女性又明显低于男性。而相邻的两个年龄组的平均受教育年数都在10年以上。他们所受教育的实际质量也明显较低。这一代人在结束了知青生活以后大都回城市从事对知识和技能要求较低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经济活动。明显的年龄和知识技能劣势使得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在目前上海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最不利和最脆弱的地位。知青一代在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通过向上流动成为管理干部和技术专家,也有相当的部分“下岗”待业或转入商业服务行业,成为“再就业”工程中最为艰巨的工作对象之一,这种分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的教育水平等原因决定的。由于职业的分化,知青一代内部不同人群从经济改革中得到的好处,以及他们对改革的态度存在较大的差异。但这种内部差异相比不同代际之间的差异又要小得多。

在知青一代的职业流动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民族是如何从十年动乱的阴影中重新振奋,通过发展工业、发展经济、重视技术教育而逐步起飞。我们看到了历史的不断前进和节奏不断加快的社会经济变迁,我们也可以看到受这一历史过程深刻影响的知青一代,虽然他们因上山下乡而失去了许多机会,但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奋力向上,充当了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为国家发展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凭借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一代人顽强地与命运拼搏着,默默地承受着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和赡老抚幼的重担。当这一代人进入老年阶段后,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将进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根据我们现行的许多社会政策措施,同时由于人口转变所推动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知青一代中的许多人将在老年以后处于相对不利的境地,对那个时期社会救助体系形成强大的压力。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可以预期,知青一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将继续分化。考虑到这一代人因自身经历而形成的对社会的观察力,和对社会支配力量的增强,这一代人将会在改革开放的现在和不远的未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因此,对这一特殊人口群体应当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潘锦棠主编,1991,《劳动与职业社会学》,红旗出版社。

李强,1993,《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

孙嘉明,1997,《观念代差/转型社会的背景(1991~1994)》,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若建,1995,“当代中国职业流动研究”,《人口研究》1995年第2期。

张琢主编,1992,《现代中国社会学(1979—1989)》,四川人民出版社。

索维A.,1992,《人口通论(下)》,商务印书馆。

Popence David,1997,“Sociology Prentice-Hall in englewood Cliffs”,*New Joexey*.1977.

作者:彭希哲系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

任远系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

责任编辑:谭深